

## 個人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偏差同儕與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關聯性之實證研究\*

張楓明\*\* 譚子文\*\*\*

### 摘 要

本研究主要係由個人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等三個層面，探討其與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之關聯性。本研究利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以臺灣之不同行政及地理區域的國民中學進行分層隨機抽樣，共計抽取八所國中共 888 名學生，並以巢式邏輯迴歸分析技巧分析所得數據資料。研究結果顯示：1.青少年之個人信念對其初次偏差行為發生具有抑制性影響力；2.負向生活事件與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間存在著正向關聯性；3.偏差同儕對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扮演著重要的解釋角色。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對相關領域之人員及未來研究發展提供相關建議。

關鍵字：初次偏差行為、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偏差同儕

---

\* 致謝：1. 本研究接受大同技術學院補助，計畫編號：TA98021。

2.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寶貴修正意見。

\*\* 大同技術學院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

\*\*\*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生，本文通訊作者

收稿日期：2011 年 5 月 12 日；通過日期：2011 年 6 月 18 日

## 壹、前言

青少年問題是當前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林衢良、林淑芬，2006；陳玉書，2005；張紉，2005），而根據內政部兒童局（2006）之調查報告，台灣地區之少年曾從事抽菸、喝酒及吃檳榔等偏差行為，以及曾有過被脅迫、敲詐及勒索等被害經驗之特殊經驗與行為者約佔 25%，而即令扣除上述相關被害經驗所佔之比率，仍有近 20%之少年曾從事過至少一項以上的偏差行為，亦即每五位青少年當中即有一位曾從事過偏差或犯罪行為，而每四位青少年當中即有一位曾從事偏差行為或有過被害經驗。對照此一調查結果，吾人可發現無論是日常生活之所見或觀讀報章媒體的報導，青少年抽煙、喝酒、吸食迷幻藥、逃學、逃家及成群結黨等情況仍是屢見不鮮，因而如何預防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仍是教育、社會、心理與其他相關領域學者的重要研究課題。其次，破窗理論（broken windows theory）指出，小違規或輕微犯罪不加以處理，有如是一種許可暗示，那將是轉變成重大犯罪之開端，此即「犯罪升級」效應。換言之，若以預防重於治療及懲罰的觀點出發，則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顯然佔有至為關鍵的地位，因為犯罪或偏差行為的後續發展及變化均與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具有關聯性。進一步而言，由於目前相關犯罪學理論並非全然針對初次偏差行為進行探討，故本研究係以理論整合的觀點切入，整合社會控制理論中之信念鏈、一般化緊張理論中之負向生活事件及差異接觸理論中之偏差同儕等概念，嘗試探討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機制，以期能對國內青少年偏差行為有更深入的瞭解，進而對台灣教育學者及相關機構提供一些能夠防範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發生的具體策略。

## 貳、文獻探討

### 一、初次偏差行為之重要性及其相關理論釋解觀點

犯罪預防是具有意義性、重要性，且值得投入與奉獻的工作，但在當前政治環境之運作下，犯罪預防成效並不易顯現，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鄧煌發，2007)。有鑑於此，本研究由犯罪預防的觀點出發，採取「生涯發展與生命過程」(developmental and life-course)的觀點分析與探討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事實上，初次偏差行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偏差行為如同人類的其他行為及事件一般，均係由發生、延續，迄終止等歷程所組成，換言之，行為及事件之初始迄終止等歷程難免受到初次發生之影響，諸如初次偏差行為發生後，可能使青少年得到增強而使其從事偏差行為之頻率增加，抑或者是遭到懲罰與告誡而降低後續行為發生的可能性(Akers, 1985)；尤其甚者，更可能在初次偏差行為發生後，遭父母、師長、同儕等重要他人，以及從事初次偏差行為的自己貼上難以撕下的負面標籤，直接或間接地將自己推入犯罪生涯的悲劇角色中而難以逃離。因此，初次偏差行為的探究實有其必要性及重要性，是以對欲深入瞭解偏差行為之相關人員而言，對初次偏差行為之探究顯然應予以格外重視。

應該加以說明的是，現今之犯罪學理論在解釋與探討青少年犯罪及偏差行為時，雖多已同時含括偏差行為的發生、延續、停止，但迄今為止仍未有全然針對初次偏差行為進行較為全面與週延的分析、探討及詮釋者。然而，眾所週知的是，犯罪學理論在瞭解與掌握犯罪及偏差行為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諸如吾人皆知理論在擬定防止偏差行為發生的策略上扮演著重要角色，顯見要建立一個有秩序的生活環境，必需要依賴適當的偏差行為理論作為指引，因為良好的犯罪理論將有助於教育學者、心理學者、社會學者，及犯罪學者探求助長或防止偏差行生發生的原因或事件。對此，邇來系統地結合不同的理論，以理解與建構偏差及犯罪行為產生過程，已成為犯罪理論發展的重要趨向，即朝向以綜合或整合性的觀點

解釋偏差及犯罪行為的形成過程 (Akers & Sellers, 2009)。而 Thornberry (1997) 亦曾指出，以發展性與多元化的觀點解釋偏差及犯罪行為的形成，方能重拾偏差行為理論的完整性及實際性。承此，就社會學取向的犯罪學理論而言，則以社會控制理論、社會學習理論及社會緊張理論等三個理論為犯罪社會學理論中的三大主要理論 (董旭英、張楓明、李威辰，2003)。兼以，鑑於 Hirschi (1969) 之社會控制理論 (social control theory)、Agnew (1992) 之一般化緊張理論 (general strain theory)，以及 Sutherland (1947) 之差異接觸理論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 不僅分別為此三類理論中具代表性之著名理論，且其中諸多概念能相互填補而加以整合。因此，本研究擬由社會控制理論中抽取信念鍵、一般化緊張理論中抽取負向生活事件及差異接觸理論中抽取偏差同儕等三個理論概念，嘗試探討其對初次偏差行為發生的影響機制，以期能對國內青少年偏差行為有更深入的了解。

## 二、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偏差同儕與初次偏差行為間關聯性之探討

經相關文獻之檢視及分析後可發現，Hirschi (1969) 之社會控制理論堪稱當前影響力最鉅的犯罪學理論之一 (張紉，2005；許春金，2003；郭豫珍，2004；Agnew, 1991；Cretacci, 2003；Krohn & Massey, 1980；Matsueda, 1989)。Hirschi 認為個人順從社會規範不致犯罪之四個社會連結，分別為「依附」(attachment)、「抱負」(commitment)、「參與」(involvement)、「信念」(belief) 等四個「鍵」(bond)。其中，若分析此四個社會連結與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的關聯性，則信念顯然有別於上述其他三個鍵而應具有頗為獨特及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茲以初次偷竊行為之發生為例，當青少年面對可採取偷竊行為擁有某一物品時，儘管其可能考慮到父母、師長及同儕等人的感受，怕失去愛或讓自己在乎的人傷心失望，但若其預設之結果為成功偷取該物品而不被任何人察覺，則其因擔憂失去愛與依附而避免或阻止自己採取偷竊行為的抑制性將大受影響。同樣的，若青少年預計其可成功竊取該物品而不被發現，則青少年自然也較不會憂心是否會波及其未來的抱負，以及目前已取得的成就或已投入於社會上傳統活動的心力會付諸流水；至於，參與

正當活動對初次偷竊行為的抑制性，則正如 Hirschi (1969) 對個人受到時間限制層面所進行的反省時即指出，偏差行為不一定是一份全職的工作，從事偏差行為其實只需要一點點時間即可，亦即青少年並不一定要投入大量的時間才能從事偏差行為。換言之，每一個青少年在面對其認為採取偷竊行徑將有利可圖時，事實上都應有足夠的時間參與此一偏差行為。顯然，當青少年認為可成功偷竊時，對青少年是否採取初次偷竊行為的影響力，則相較於上述三類社會連結，更重要的將可能是道德因素，亦即正是信念要素的核心概念才能適時地發揮關鍵作用 (Chriss, 2007)。換言之，信念將較不受到是否被發現之算計所影響，其雖也可能會考量到代價、報酬及利潤等狀況，但信念主要是個人是否相信社會的中心價值 (Shechory & Laufer, 2008)，因而只要青少年仍相信社會規範，則信念在其預計採取初次偷竊行為取得他人物品時，應仍可如影隨形地控制著青少年決定是否從事犯罪及偏差行為，故本研究首先將由社會控制理中抽取信念鍵，嘗試探討其對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的影響究竟為何。

承上所述，所謂「信念」係指是個人認為其行為應該合於道德且應遵行的一般法律和社會秩序，而決定個人是否從事偏差行為或犯罪的因素，就在信念本身程度的強弱，也就是「信念」這個社會鍵的強弱。因此，當個人愈不信任團體的規範時，愈可能會從事偏差行為；反之，當個人愈信任團體的規範，就愈不會從事偏差行為。值得一提的是，就社會控制理論的觀點而言，合於法律、習俗及道德的信念是一直存在與影響著個體的，故需要探討的是個體之信念何以薄弱至無法控制其從事初次偏差行為。對此，本研究納入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應有助釐清與掌握信念對初次偏差行為之影響情形。其中，所謂的負向生活事件的概念，係根據 Agnew (1992) 之一般化緊張理論概念延伸得來。Agnew 認為當個人無法使用合法的方式，避免或降低挫折感及焦慮等情緒時，便會產生偏差或犯罪行為。據此，一旦青少年遭逢與面對親人亡故、父母離異、失戀、好友病重，以及父母親失業或家中經濟發生困難時，將使其受到負面影響，進而導致緊張或憤怒的情緒，此時過去青少年一直以來信奉與遵守的信念，或恐將遭到影響而使其信仰、忠誠、信念對其偏差行為發生與否之影響力產生變化。易言之，信守傳

統道德觀念的信仰及負向生活事件，在影響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與否時可能相互影響（Cloward & Ohlin, 1960; Simons, Chen, Stewart, & Brody, 2003）。至於偏差同儕的概念，則係根據 Sutherland（1947）之差異接觸理論概念延伸得來。Sutherland 認為個人的犯罪行為、動機及技巧的獲取是一種學習的過程，是由非犯罪者經由接觸犯罪者的過程中習得，而個人若與犯罪者接觸次數愈多，愈容易犯罪。換言之，當青少年與偏差同儕的互動愈頻繁、愈漸轉趨認同偏差同儕的想法與觀點時，其信念將遭致愈多的衝擊，諸如將偏差同儕視為楷模而受到增強，進而致使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唯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也可能因不良同儕之偏差行為受到懲罰而使其對符合社會期許與規範的信念更加堅定而避免從事偏差行為。綜上所述可知，此三個理論概念與初次偏差行為間之關聯結構，實有待相關實證研究進行分析與探討，故本研究嘗試建構一個同時包涵信念、生活負向事件及偏差同儕等概念的初次偏差行為解釋模式，以期能對國內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有更深入的瞭解。

最後，應該加以說明的是，儘管相關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理論文獻及實證研究相當眾多，如相關社會控制理論的實證研究即汗牛充棟，以 Kempf（1993）之發現為例，其曾利用控制、社會控制、社會鍵、Hirschi 等關鍵字進行搜尋，發現自 1970 迄 1991 年之間，相關 Hirschi 社會控制理論的實證研究即高達 71 個之多，而近年來仍不乏相關研究依據、粹取或整合此理論觀點進行分析與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侯崇文，2000；范國勇，2001；張楓明，2003；蘇尹翎，2003；Erickson, Crosnoe, & Dornbusch, 2000; Huebner & Betts, 2002; Kingsley, 2005; Shechory & Laufer, 2011; Stack, Wasserman, & Kern, 2004），惟信念並非總是納入分析與探討的脈絡中，且其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影響力仍有待驗證，是以信念對於初次偏差行為的影響機制實亦同樣須進一步進行探究與檢證。至於相關一般化緊張理論的實證研究亦不遑多讓（彭怡芳，2002；黃家珍，1999；董旭英，2003；Agnew & Helene, 1992; Brody, 2001; Hoffmann, 2002; Hoffmann & Su, 1997; Lin, Cochran, Mieczkowski, 2011; Robert, Susan, & Jennifer, 2000），且相關研究之結果多發現青少年若遭逢與面對負面生活事件，將影響與增加其偏差行為的發生。同樣的，針

對偏差同儕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關聯性進行探討之實證研究亦為數頗豐（范國勇，2001；張晶惠，2003；張麗鵬，2003；許春金，1997；陳玉書，2000；陳玉書、簡惠露，2002；曾浚添，2003；黃俊傑、王淑女，2001；鄧煌發，2000；Brendgen, Vitaro, Tremblay, & Wanner, 2002; Chapple, 2005; Demuth, 2004; Longshore, Chang, & Messina, 2005; May, 2003），且整體而言，其研究結果亦多發現偏差同儕對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扮演著重要的解釋角色。然而，儘管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應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間具有關聯性，唯其對初次偏差行為發生之影響性則仍值得進一步加以檢視，兼以同時涵括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等三大犯罪社會理論概念對初次偏差行為進行系統性之分析與探討者仍甚為罕見，故本研究即基於此嘗試進行分析與探討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成因。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之發生情形及成因，研究之設計、內涵及測量變項涵蓋不同犯罪社會學理論，兼以初次偏差行為的測量方式較為特殊等原因，而觀諸相關次級資料均無法提供適合之資料以作為分析，故為能滿足本研究對變項測量的需求並達到上述預期目標，本研究係以自編之問卷調查進行蒐集資料，再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茲將各項研究設計及方法逐一說明如下：

###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採取理論整合之解釋模式，以一個具系統性的理論概念整合架構去解釋台灣國中學生初次偏差行為的成因，進而藉研究結果對當前台灣防止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提供具體建言。易言之，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之成因，並希冀研究發現能有助於釐清與明瞭初次偏差行為之發生情形。再者，由於本研究係由社會控制理論、一般化緊張理論及差異接觸理論中抽取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等三個理論概念，並嘗試藉由實證檢驗，以擬出此一社會事實更清楚的圖像。由此可知，本研究主要希望回答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偏差同儕等三種影響因素是否與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間具有關聯性。

### 二、研究工具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利用自陳問卷調查法，問題形式將以結構式的自答題為主。在問卷設計方面，將由研究者以社會控制理論、差異接觸理論及一般化緊張理論的重要概念為基礎，輔以國內外相關文獻修訂編製而成。進一步而言，本研究的問卷設計除了包括國中生之基本資料及初次偏差行為發生狀況外，亦將包括社會控制理論中之信念變項、一般化緊張理論中之負向生活事件變項及差異接觸理論中之偏差同儕變項等。藉此，建構一個較完整的測量工具以檢視一個理論整合之解釋模型是否具有實徵性。

再者，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之抽樣對象為台灣地區國民中學學生，主要則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首先，第一階段先抽選學校，本研究依照台灣地區之不同行政區及地理區域為背景，將台灣地區區分為北部（台北市、台北縣）、中部（台中市、台中縣）、南部（高雄市、高雄縣）、東部（台東市、台東縣），再由各縣市抽出一所國民中學。接著，第二階段再從各選取調查之學校中，分別針對一、二、三年級，以班級為單位隨機選取群組，而被選出的組群的所有成員皆為樣本，其中各學校班級被抽取的機率皆相等，使樣本的分配接近母體，最終合計總樣本數共 888 名。應該加以說明的是，由於受訪者可能於年幼或較早之前即曾從事過偏差行為，而儘管甚早即曾從事過偏差行為青少年，甚至是早發型之非行少年亦是相關學者之關注焦點，且影響及促使其從事偏差行為的成因亦值得深入進行探究，惟本研究考量不同時空背景之脈絡因素甚難釐清，故主要探討青少年在過去一年以來的時空背景下，第一次偏差行為的發生與否，以及其於過去一年來第一次從事偏差行為之影響因素為何，故逾一年前即曾從事偏差行為之受訪國中生的初次偏差行為發生情形及成因已逾本研究之範圍，是以本研究排除 278 名超過一年以前即曾從事過偏差行為之國中生，以及 5 名未完成題項填答的缺失樣本數，而係以 605 名從未或曾於過去一年內從事過初次偏差行為之國中生進行分析與探討。

### 三、變項測量

承上所述，本研究依據社會控制理論、差異接觸理論及一般化緊張理論的重要觀點編訂不同變項量表：

#### （一）依變項：「初次偏差行為量表」

本研究中關於初次偏差行為的題項設計，主要參酌許春金、孟維德（1997）之「自陳偏差行為量表」、許春金、馬傳鎮（1997）之「大台北地區少年發展研究問卷（一）」，以及黃富源（2000）之「青少年日常生活量表」等相關資料，並以「違反任何團體規範的行為」作為初次偏差行為之涵義與範疇，修訂而成。此

一部分由十九項偏差行為所構成，包括：「破壞公物或他人物品」、「與他人發生性關係」、「深夜在外遊蕩」、「辱罵或頂撞師長」、「攜帶刀械等武器」、「飆車」、「抽煙」、「出入賭博性電玩等不良場所」、「離家出走」、「吸毒」、「打架」、「放學後流連網咖」、「賭博」、「蹺課或逃學」、「徒手或以武器傷害他人」、「恐嚇、威脅或勒索他人」、「參加幫派活動」、「未經允許而拿走他人的錢財、物品或腳踏車、汽機車」、「閱讀色情黃色書刊、觀賞影片、網站或光碟」等偏差行為。再者，此部分之作答方式由受訪者就「第一次」從事偏差行為之發生時間選擇適當答案，做為實際發生初次偏差行為的情形。其反應項包括：「從未」、「過去一年以內」、「超過一年以前」等三個選項。其中，填選「超過一年以前」者予以剔除。而在建構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指標時，就受訪者之初次偏差行為發生與否計分，凡在過去一年內第一次從事上述行為者給「1」分，皆未曾發生者給「0」分。意即初次偏差行為變項所取的值為 1 時，受訪者曾於一年內初次發生至少一種上述偏差行為。

## (二) 自變項

本研究之自變項包括「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偏差同儕」等變項。各個研究變項之意涵與測量方法如下：

### 1. 「信念」變項

信念變項主要參考 Hirschi (1969)、潘秉松 (2001)，以及李君儀 (2003) 之少年法律集體意識之調查問卷，建構出下列七項題目做為測量國中生之信念情形，包括我覺得應該要盡量使自己的行為符合學校規定；有了法律人們就應該遵守；法律能主持社會正義；法律對每一個人都是公平的；法律的目的在於維持社會秩序；如果我做了犯法的事，就會覺得難過；犯法的人總有一天會被捉到的等題項。其中，問題之答項則包括「非常不符合」、「有點不符合」、「有點符合」，以及「非常符合」四者之四點量表。其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4，所得值愈高，代表國中生之信念程度愈高。再者，內部一致性信度為.87，而進行因素分析時，結果萃取出一個因素，因素負荷值介於.59 到.81 之間，可解釋之變異量為 50.23%。

## 2. 「負向生活事件」變項

負面生活事件變項主要參考董旭英(2003)之社會緊張量表及黃家珍(1999)之負面生活事件量表，由九個測量題目所組成，包括失戀；好朋友去世；好朋友分開或失去聯絡；父母分居或離婚；父親或母親與他人同居；家人去世；發生嚴重意外事故（如車禍）；父親或母親失業；家中經濟發生困難或負債等題項。以上答項包括「在過去一年內曾發生」及「未曾發生」，並依據發生與否計分，在過去一年內曾發生者給了「1」分，未曾發生者給了「0」分，意即負向生活事件變項所取的值為1時，受訪者曾於一年內遭逢至少一種上述負向生活事件。

## 3. 「偏差同儕」變項

偏差同儕變項係依據 Sutherland(1947)、范國勇(2001)，以及張楓明(2006)之青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問卷，建構出下列五項題目做為測量國中生之接觸偏差同儕情形，包括經常逃學或曠課的朋友；曾有違法行為而進出警察局的朋友；曾經打過群架（或集體械鬥）的朋友；曾經逃家或離家出走的朋友；已經輟學的朋友等題項。其中，問題之答項則包括「0位」、「1-2位」、「3-5位」、「6-10位」，以及「11位以上」五者之五點量表。回答人數愈多者代表其接觸偏差行為的友伴愈多。再者，內部一致性信度為.88，而進行因素分析時，結果萃取出一個因素，因素負荷值介於.72到.89之間，可解釋之變異量為63.19%。

### （三）控制變項

由於個人屬性變項可能會對研究結果造成影響或扭曲。故本研究擬納入個人特質及家庭背景作為控制變項。檢視當納入這些控制變項後，自變項與初次偏差行為間之關係是否產生變化，藉以建立一個較為完整的分析例子，並檢驗自變項和依變項間是否存在假性相關。

#### 1. 個人特質：

（1）「性別」，分別為男性取值為1，女性取值為0。

- (2)「年齡」，詢問受訪者之出生年及月等資訊後進行換算，受訪者所得之數值愈高，表示其愈年長。

2. 家庭背景：

- (1) 「父母教育程度」，從不識字至研究所以上分為七個等級。不識字給1分，研究所給7分，值愈高表示其教育程度愈高。
- (2)「家庭經濟狀況」，從下到上分為五個等級。其最小值為1，最大值為5，值愈高代表家庭經濟狀況愈好。

####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於資料收集及資料檔建立完成後，第一階段資料處理主要是以次數分配、平均值、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加以分析，以瞭解各變項資料的分數集中與分散情形。經此一階段的資料整理、描述及解釋，進而初步了解國中生之現況，以便進一步處理資料；接著，再以積差相關、點二系列相關及 $\psi$ 相關等相關分析針對各變項間，以及各變項與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間的關聯性進行分析；最後則採用巢式邏輯迴歸分析（nest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以五組模型探討自變項與依變項（初次偏差行為）之關聯。其中，在模型一只包括信念變項；在模型二包括信念變項及負向生活事件變項；在模型三包括信念變項及偏差同儕變項；模型四則同時納入信念變項、負向生活事件變項及偏差同儕變項；最後在模型五中加入個人特質及家庭背景控制變項的影響，分析是否對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等變項與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關係發生變化。此分析程序主要在檢視自變項與自變項間在影響依變項時，是否存在著相互影響之情形，以及自變項與依變項間是否存在假性顯著關係（spurious relation），鑑別出不同分析層級變項的差異影響，進而提供一個較為精確的相關模型。

## 肆、研究結果

### 一、各變項之描述性資料分析

本節分別介紹研究分析所發現之結果並加以說明。從表 1 可以瞭解本研究所包含之各變項的數值分佈情形及平均值狀況，於此主要就依變項及各自變項作說明。首先，就初次偏差行為發生與否之統計概況而言，依據表 1，曾於一年內至少從事過壞公物或他人物品、與他人發生性關係等上述十九項初次偏差行為中任何一項之青少年共 200 位，占 33.1%，從未曾從事過上述十九項初次偏差行為中任何一項之青少年共 405 位，占 66.9%。換言之，過去一年內曾從事過初次偏差行為者較從未曾從事過初次偏差行為者少，惟比例頗高至足以令人憂心。再者，在自變項方面，信念之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4，平均數值為 3.21，標準差為 .54，這意味著就整體而言，國中生頗為認同其行為應該合於道德且應遵行的一般法律和社會秩序；至於曾於一年內遭逢失戀、與好朋友分開或失去聯絡等上述九項負向生活事件之青少年共 501 位，占 85.5%，而過去一年內未曾遭逢上述九項負向生活事件之青少年共 85 位，占 14.5%。換言之，大多數之國中生曾於過去一年內遭逢致使其處於緊張狀態的負向生活事件，而這結果意味著國中生在其成長與生活的情境中有不少困擾或問題情境需面對及處理，實須家長及教師投注更多心力加倍關注與提供協助；而偏差同儕變項之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5，平均值為 1.28，標準差為 .56，亦即就整體而言，本研究樣本中之國中階段的青少年，其同儕朋友中曾發生過上述偏差行為的人數甚低。

最後，在控制變項方面，男性樣本數為 260，佔樣本數的 43.2%，女性樣本數為 342，佔所有樣本數的 56.8%，即本研究樣本中之男性樣本少於女性樣本；年齡則介於 11.25 歲至 15.75 歲之間，平均為 13.59 歲；而關於受訪之國中生的父母親教育程度，最小值均為 1，最大值均為 7，平均值則分別為 4.21 及 4.08，亦即就整體而言，本研究樣本中之受訪國中生的父親教育程度略高於母親教育程度，約介於高中職至專科程度之間，而較偏向高中職程度；至於家中經濟狀況，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5，平均值為 3.02，亦即就整體而言，大多數的國中生中認

為其家中經濟狀況與一般家庭比較之下相差不大。

表 1 各變項之描述統計

變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百分比%	樣本數
依變項						
初次偏差行為						605
未發生					66.9	405
已發生					33.1	200
自變項						
信念	1.00	4.00	3.21	.54		586
負向生活事件						586
有					85.5	501
無					14.5	85
偏差同儕	1.00	5.00	1.28	.56		600
控制變項						
性別						602
男性					43.2	260
女性					56.8	342
年齡	11.25	15.75	13.59	.87		587
父親教育程度	1	7	4.21	1.17		579
母親教育程度	1	7	4.08	1.09		580
家庭經濟狀況	1	5	3.02	.70		604

## 二、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情形

表 2 呈現信念、負面事件及偏差同儕與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間之相關分析。由初步的相關分析結果看來，「信念」( $r = -.17$ ) 與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間呈現顯著負相關，而「負向生活事件」( $\psi = .17$ ) 與「偏差同儕」( $r = .27$ ) 則與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間呈現顯著正相關，亦即未曾從事初次偏差行為之國中生，其愈信守社會規範、習俗、法律及道德，而曾從事初次偏差行為之國中生，其較常遭遇負向生活事件，且接觸偏差同儕人數愈多的國中生，愈可能從事初次偏差行為。然而，相關係數只能顯示變項間在假設其他條件相同時的相關程度，故僅作為進行迴歸分析時的初步依據。因此，以下使用巢式邏輯迴歸分析方法，進一步檢驗信念、負面事件及偏差同儕對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的影響，以提供一較

精確的實證檢驗依據。另外，亦值得注意的是，信念與偏差同儕間之關聯性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亦即愈認為自己應該遵守道德、法律和社會規範的國中生，接觸偏差同儕人數愈少，至於負向生活事件與信念間之關聯性，以及負向生活事件與接觸偏差同儕間之關聯性，則均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表2 信念、負面事件及偏差同儕與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之相關分析

變項類別	初次偏差行為	信念	負向生活事件	偏差同儕
初次偏差行為	1			
信念	-.17*** <sup>註2</sup>	1		
負向生活事件	.17*** <sup>註3</sup>	.01 <sup>註2</sup>	1	
偏差同儕	.27*** <sup>註2</sup>	-.29*** <sup>註4</sup>	.07 <sup>註2</sup>	1

註：1. \*：p<0.05；\*\*：p<0.01；\*\*\*：p<0.001

2.點二系列相關

3.ψ 相關；ψ=0.17037，p<0.001； $\chi^2=15.325$ ，p<0.001； $\chi^2=N\psi^2=528*(0.17037)^2=15.325$

4.積差相關

### 三、個人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偏差同儕與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關聯性

表 3 呈現社會控制理論中抽取信念鍵、一般化緊張理論中抽取負向生活事件及差異接觸理論中抽取偏差同儕等三個理論概念與初次偏差行為之巢式邏輯迴歸模型分析結果，並分述如下：

#### (一) 檢視個人信念的影響

首先，由模型一之研究結果可知，檢視個人信念變項與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之關聯性部分，整個模式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 $\chi^2=15.80$ , p<.001)。在檢視個別解釋力後，信念變項之邏輯迴歸係數為-.69 (p<.001) 已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換言之，信念相較於平均水準能使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比變化 .5 倍

( $\text{Exp}(B)=.50$ )，亦即信念能抑制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從效果係數值可知 Cox-Snell  $R^2$  值為 .03，Nagelkerke- $R^2$  (類  $R^2$  指標) 值為 .04，擬似的  $R^2$  解釋量分別為 3%、4%。

## (二) 檢視個人信念、負向生活事件的影響

其次，根據模型二之研究結果可知，檢視負向生活事件、個人信念變項與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之關聯性部分，整個模式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 $\chi^2=34.06$ ,  $p<.001$ )。進一步觀察發現，在納入負向生活事件變項後，信念與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關聯性依然達到顯著水準 ( $B=-.72$ ,  $p<.001$ )，且負向生活事件變項之邏輯迴歸係數為 1.39 ( $p<.001$ ) 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當個人信念及負向生活事件各增加一個單位將會使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比變化.49 倍 ( $\text{Exp}(B)=.49$ )、4.02 倍 ( $\text{Exp}(B)=4.02$ )。亦即國中生之個人信念仍能抑制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而負向生活事件則可能會促使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從效果係數值可知 Cox-Snell  $R^2$  值為 .06，Nagelkerke- $R^2$  (類  $R^2$  指標) 值為 .09，擬似的  $R^2$  解釋量分別為 6%、9%。

表 3 信念、負面事件及偏差同儕與國中生成初次偏差行為之巢式邏輯迴歸模型

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B	Exp(B)								
信念										
負向生活事件	-.69***	.50	-.72***	.49	-.46*	.63	-.48*	.62	-.42*	.66
偏差同儕			1.39***	4.02			1.35***	3.87	1.53***	4.60
性別 (女性=參照團體)					1.03***	2.80	.98***	2.65	.99***	2.69
控制變項										
年齡									.96***	2.60
父親教育程度									.13	1.14
母親教育程度									-.06	.93
家庭經濟狀況									-.03	.97
常數	1.42*		.26		-.64		-1.73*		-.16	.86
Goodness of Fit (H-L 指標)	4.48		5.15		14.26		1.906		4.19	
Model Chi-Square (模型 $\chi^2$ )	15.80***		34.06***		41.72***		57.46***		81.51***	
Cox & Snell R 平方	.03		.06		.08		.10		.14	
Nagelkerke-R <sup>2</sup> (類 R <sup>2</sup> 指標)	.04		.09		.11		.15		.20	
n	528		528		528		528		528	

註：1. \*：p<.05；\*\*：p<.01；\*\*\*：p<.001  
2. VIF<2

### (三) 檢視個人信念、偏差同儕的影響

在模型三同時納入信念變項及偏差同儕變項進行分析，檢視偏差同儕、個人信念變項與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之關聯性部分，整個模式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 $\chi^2=41.72, p<.001$ )。研究結果發現信念與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關聯性同樣仍達到顯著水準 ( $B=-.46, p<.05$ )，且偏差同儕變項之邏輯迴歸係數為 1.03 ( $p<.001$ ) 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當個人信念及偏差同儕各增加一個單位將會使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比變化 .63 倍 ( $\text{Exp}(B)=.63$ )、2.8 倍 ( $\text{Exp}(B)=2.80$ )。易言之，國中生之個人信念仍能抑制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而偏差同儕則會增加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機會。從效果係數值可知 Cox-Snell  $R^2$  值為 .08，Nagelkerke- $R^2$  (類  $R^2$  指標) 值為 .11，擬似的  $R^2$  解釋量分別為 8%、11%。

### (四) 檢視個人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偏差同儕及控制變項的影響

接者，在模型四中則同時納入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變項共同分析，從表 3 可知，整體模式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 $\chi^2=57.46, p<.001$ )。在檢視個別解釋力後，發現國中生之個人信念與其初次偏差行為的關聯性依然達到顯著水準 ( $B=-.48; p<.05$ )，而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亦然，同樣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 $B=1.35, p<.001; B=.98, p<.001$ )。表示當個人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各增加一個單位將會使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比變化 .62 倍 ( $\text{Exp}(B)=.62$ )、3.87 倍 ( $\text{Exp}(B)=3.87$ ) 及 2.65 倍 ( $\text{Exp}(B)=2.65$ )。換言之，國中生之個人信念能抑制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而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則會增加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機會。模型四的效果係數 Cox-Snell  $R^2$  值為 .10，Nagelkerke- $R^2$  (類  $R^2$  指標) 值為 .15，擬似的  $R^2$  解釋量分別為 10%、15%。

最後，在模型五中加入個人特質及家庭背景控制變項後，由表 3 分析結果可知，整個模式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 $\chi^2=81.51, p<.001$ )。在檢視個別解釋力後則發現，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等變項對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所產生之效應未產生重大的變化 ( $B=-.42, p<.05; B=1.53, p<.001; B=.99, p<.001$ )，信念、

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對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所產生之效應，依然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水準。表示當個人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各增加一個單位將會使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比變化 .66 倍 ( $\text{Exp}(B)=.66$ )、4.60 倍 ( $\text{Exp}(B)=4.60$ ) 及 2.69 倍 ( $\text{Exp}(B)=2.69$ )。此外，由控制變項中可發現，性別變項達到顯著水準 ( $B=.96$ ； $p<.001$ )，而年齡、父母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則未達統計上顯著效應 ( $p>.05$ )。模型五的效果係數 Cox-Snell  $R^2$  值為 .14，Nagelkerke- $R^2$  (類  $R^2$  指標) 值為 .20，擬似的  $R^2$  解釋量分別為 14%、20%。

## 伍、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個人信念、負向生活事件及偏差同儕等因素對其初次偏差行為發生與否的影響性。依據分析結果得知，過去一年內曾從事過初次偏差行為者雖較從未從事過初次偏差行為者少，但其比例逾為 33%，亦即約略每三人即有一人曾從事過初次偏差行為，即便不計超過一年前即曾從事偏差行為者，此結果相較內政部兒童局 (2006) 調查報告之每五位青少年當中即有一位曾從事過偏差或犯罪行為而言，顯然更為普遍化及嚴重化，此現象可能是本研究之偏差行為內涵中不僅包含情節較嚴重之偏差行為，亦涵括如破壞公物或他人物品等嚴重性較輕微之偏差行為所致。本研究亦發現國中生尚稱認同合於道德且應遵行的一般法律、社會秩序及學校規定，且研究結果發現信念能抑制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亦即若能使青少年持續贊同與信任合於傳統的價值與規範，則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發生的機會將降低。質言之，這結果意味著建構與內化青少年合於傳統價值與規範的信念，且維繫其信念而不致轉趨或變得薄弱實有其重要性，且其將為防止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發生的重要策略之一。惟仍須留心的是，雖然研究發現信念能降低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機會，但本研究之信念範疇主要為法規範意識，仍有諸多因素可能影響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因而對此仍有待相關研究進一步深入加以探討，以求更有效降低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

再者，曾於一年內遭逢負向生活事件之國中生逾 85%，儘管此一比例可能係由於本研究中之負向生活事件包括類型眾多且情節嚴重性及影響性大小不一均涵括所致。然而，由於不同事件之影響性及嚴重性非僅由該事件即足以代表，更須視該事件如何被青少年認知、看待與解讀（唐璽惠、王財印、何金針、徐仲欣，2005）換言之，一旦青少年遭逢這些負向生活事件，雖或不須事事放大視之，卻也絕不容輕視之。甚且，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曾於一年內遭逢負向生活事件之青少年較之未曾於一年內遭逢負向生活事件之青少年，其初次偏差行為的發生機會較高，顯見吾人實應留心與關注負向生活事件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以避免其在無法使用合法的方式，降低或消除挫折感及焦慮等情緒時，將致使初次偏差或犯罪行為的發生。至於，偏差同儕對於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的影響力，在本研究中亦獲得支持。此一結果顯示，儘管本研究發現青少年的同儕朋友中曾經逃家、蹺課或械鬥等偏差行為的人數甚低，但偏差同儕對於增加國中生初次偏差行為發生機會的影響力仍不容輕忽。

最後，本研究主要有下列研究限制仍未克服：首先，儘管本研究已嘗試整合不同犯罪學理論之重要概念，且控制部分個人屬性及其家庭背景變項，但無可否認的是，仍有重要影響因素未能納入分析探討，且亦不乏有相關變數未能予以控制，未來若能一併納入探討與分析，應能有更進一步的發現與結果。其次，受限於時間與經費之考量，本研究屬於橫斷式之靜態分析的研究，存在著無法測量研究對象之初次偏差行為影響因素變化情形的限制，亦無法針對初次偏差行為發生時點早於研究施測時點逾一年以上者進行分析與探討，故對於初次偏差行為發生之解釋實有所囿，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採用貫時性研究，如事件史分析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以動態分析方式探求青少年初次偏差行為發生情形及其影響因素之動態圖像，進而提供相關人員及單位更全面而周詳的考量資訊與參考佐證。

## 參考書目

### 中文參考資料

- 內政部兒童局 (2006)。九十四年臺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少年報告書。台中：內政部兒童局。
- 李君儀 (2003)。犯罪少年與非犯罪少年法律集體意識之比較研究。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
- 林衢良、林淑芬 (2006)。青少年身體自我概念、休閒參與型態與偏差行為之研究。運動休閒餐旅研究，1 (2)，50-64。
- 侯崇文 (2000)。青少年偏差行為—社會控制理論與社會學習理論的整合。犯罪學期刊，6，35-62。
- 范國勇 (2001)。少年偏差行為理論整合之預測模式。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2，75-100。
- 唐璽惠、王財印、何金針、徐仲欣 (2005)。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台北：心理。
- 張紉 (2005)。青少年偏差及犯罪行為問題。載於瞿海源、張苙雲 (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 2005 (頁 402-435)。台北：巨流。
- 張晶惠 (2003)。社會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雲嘉地區國中生 87-88 年間固定群資料分析。載於齊力、董旭英 (主編)，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剖析 (頁 225-252)。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
- 張楓明 (2003)。社會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以雲嘉地區為例。載於齊力、董旭英 (主編)，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剖析 (53-80 頁)。嘉義縣：南華大學教社所。

- 張楓明 (2006)。社會控制理論之「參與」因素對青少年偏差行為抑制性之實證研究。犯罪學期刊，9 (2)，69-96。
- 張麗鵬 (2003)。媒體閱聽、同儕關係與少年偏差行為相關性之研究—以南投地區為例。犯罪學期刊，6 (2)，217-250。
- 許春金 (1997)。閩南籍、客家籍、山地籍少年偏差行為之類型、盛行率及成因之比較分析。中央警察大學學報，30，141-180。
- 許春金 (2003)。犯罪學。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 許春金、孟維德 (1997)。家庭、學校、自我控制與偏差行為。中央警察大學學報，30，225-256。
- 許春金、馬傳鎮 (1997)。少年偏差行為早年預測之研究--第一年研究報告。台北：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 郭豫珍 (2004)。Hirschi 控制理論的原初觀點與發展：家庭與父母管教方式在子女非行控制上的角色。犯罪學期刊，7 (1)，49-80。
- 陳玉書 (2000)。青少年從事特種行業理論模式之實證檢驗。中央警察大學學報，37，253-276。
- 陳玉書 (2005)。犯罪問題。載於瞿海源、張苙雲 (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 2005 (頁 436-471)。台北：巨流。
- 陳玉書、簡惠露 (2002)。成年受保護管束再犯預測之研究。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報，3，153-178。
- 彭怡芳 (2002)。緊張、負面情緒青少年偏差行為之研究：以台南地區為例。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
- 曾浚添 (2003)。少年 (女) 初次發生非暴力偏差或犯罪行為其演變過程及自我觀之研究。犯罪學期刊，6 (1)，187-228。

- 黃俊傑、王淑女 (2001)。家庭、自我概念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應用心理研究，11，45-68。
- 黃家珍 (1999)。緊張與少年偏差行為：Agnew 一般緊張理論之實證研究。國立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
- 黃富源 (2000)。少年暴力犯罪相關因素之研究—家庭結構、動力與社會學習觀點以論。台北：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 董旭英 (2003)。一般化緊張理論的實驗性檢驗。犯罪學期刊，6 (1)，103-128。
- 董旭英、張楓明、李威辰 (2003)。青少年犯罪與偏差行為理論。載於齊力、董旭英 (主編)，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剖析 (頁 31-52)。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
- 潘秉松 (2001)。飆車少年與一般少年之社會連結及刺激尋求相關因素之比較研究。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中。
- 鄧煌發 (2000)。輟學少年之家庭與社會學習因素的比較分析。犯罪學期刊，5，23-276。
- 鄧煌發 (2007)。犯罪分析與犯罪學理論—環境犯罪學理論之應用與評析。警學叢刊，38 (1)，1-20。
- 蘇尹翎 (2003)。社會連結與雲嘉地區少年偏差行為之研究。載於齊力、董旭英 (主編)，台灣青少年偏差行為之剖析 (頁 81-110)。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

#### 外文參考資料

- Agnew, R. (1991). A longitudinal test of social control theory and delinquenc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8(2), 126-156.

- Agnew, R. L. (1992).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30, 47-88.
- Agnew, R., & Helene, R.W. (1992). An Empirical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Criminology*, 30, 475-499.
- Akers, R. L. & Sellers, C. S. (2009). *Criminological Theories: Introduction, Evaluation, and Appli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endgen, M., Vitaro, F., Tremblay, R. E., & Wanner, B. (2002). Parent and Peer Effects on Delinquency-related Violence and Dating Violence: A Test of Two Mediation Models. *Social Development*, 11(2), 225-244.
- Broidy, M.L. (2001). A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Criminology*, 39(1), 9-35.
- Chapple, C. L. (2005). Self-Control, Peer Relations, and Delinquency. *Justice Quarterly*, 22(1), 89-106.
- Chriss, J. J. (2007). The functions of the social bond.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8(4), 689-712.
- Cloward, R., & Ohlin, L. (1960).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Glencoe, IL: Free Press.
- Cretacci, M. A. (2003). Religion and social control: an application of modified social bond on violence.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28(2), 254-277.
- Demuth, S. (2004). Understanding the delinquenc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loners. *Youth and Society*, 35 (3), 366-392.
- Erickson, K. G., Crosnoe, R., & Dornbusch, S. M. (2000). A social process model of adolescent deviance: Combining social control and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perspectives. *Youth and Adolescence*, 29 (4), 395-425.

Hirschi, T. (1969).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ffmann, J. P. (2002).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strain theories of delinquency. *Social Forces*, 81(3), 753-785.

Hoffmann, J.P., & Su, S.S. (1997). The conditional effects of stress on delinquency and drug use: a strain theory assessment of sex differenc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4(1), 46-78.

Huebner, A. J., & Betts, S. C. (2002). Exploring the utility of social control theory for youth development. *Youth & Society*, 34(2), 123-145.

Kempf, K. L. (1993). The empirical status of Hirschi's control theory. In W. S. Laufer & F. Adler (Eds.), *Advances in criminological theory* (Vol. 1, pp. 143-185). New Brunswick, N.T.: Transaction Publishers.

Kingsley, E. (2005). Juveniles and status offenses: The impact of Hirschi's bonds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Scholars*, 6. Retrieved August 24, 2005, from <http://faculty.mckendree.edu/scholars/summer2005/kingsley.htm>

Krohn, M. D. & Massey, J. L. (1980). Social control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An examination of the elements of the social bond.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1(4), 529-543.

Lin, W. H., Cochran, J. K., & Mieczkowski, T. (2011). Direct and vicarious violent victimization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An application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Sociological Inquiry*, 81(2), 195-222.

Longshore, D., Chang, E., & Messian, N. (2005). Self-Control and Social Bonds: A Combined Control Perspective on Juvenile Offending.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21(4), 419-437.

- Matsueda, Ross L. (1989). The dynamics of moral beliefs and minor deviance. *Social Forces* 68(2), 428-457.
- May, D. C. (2003). Nonsocial Reinforcement and Violence: Can Juvenile Justice Policies be Effective Against Intrinsic Gratification Received from Violent Activity among Youth. *Journal for Juvenile Justice and Detention Services*, 18(1), 9-59.
- Robert, H.A., Susan, G., & Jennifer G. ( 2000 ). Life stress, anger and anxiety, and delinquency: An empirical test of general strain theor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1, 256-275.
- Shechory, M., & Laufer, A. (2008). Social control theory and the connection with ideological offenders among Israeli youth during the Gaza Disengagement perio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2, 454-473.
- Shechory, M., & Laufer, A. (2011). Ideological delinquency: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Israeli youth during the withdrawal from the gaza str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5(2), 326-343.
- Stack, S., Wasserman, I., & Kern, R. ( 2004 ) . Adult social bonds and use of internet pornograph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5 ( 1 ) , 75-88.
- Simons, R. L., Chen, Y. F., Stewart. E. A., & Brody, G. H. (2003). Incidents of discrimination and risk for delinquency: A longitudinal test of strain theory with an African American sample. *Justice Quarterly*, 20(4), 827-854.
- Sutherland, Edwin H. ( 1947 ) .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Fourth ed.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Thornberry, T. P. (1997). *Developmental Theories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 Belief, Negative Life Event, Deviant Peer, and onset of delinquency

Feng-Ming Chang\*    Tzyy-Wen Tan\*\*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how adolescent belief, negative life event, and deviant peer were related to onse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delinquency.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The sample in this study consisted of 888 students from 8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In this study, nest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was mainly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adolescent belief had negative impacts on onset of delinquency; (2) there wer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onset of delinquency; (3) deviant peer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planation of onset of delinquency.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study also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Keywords: onset of delinquency, belief, negative life event, deviant peer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Tatu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and Technology

\*\*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Criminology. Ph. D. program in Criminology.